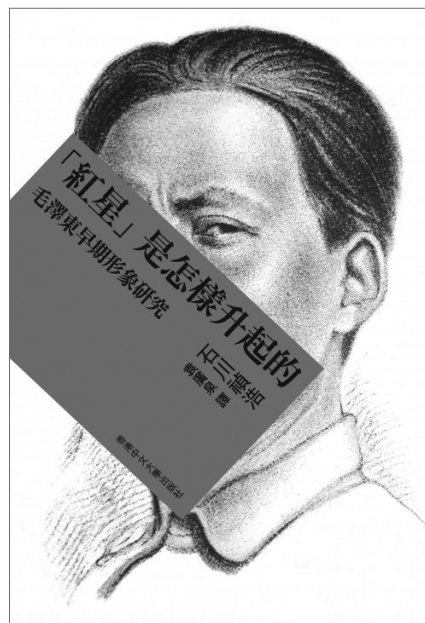


史學家的矜持與自省

——評石川禎浩《「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

• 周 俊



由於史料的匱乏與意識形態的束縛，許多關於早期毛澤東的作品與其說是學術著作，還不如說是在重新塑造傳說。《紅星》的目的在於將累積而成的毛澤東形象層層分解，回溯其最初的歷史源流與演變。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一 前言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然而，研究毛澤東，特別是研究早期毛澤

東的問題絕非易事。由於史料的匱乏與意識形態的束縛，許多關於早期毛澤東的作品與其說是學術著作，還不如說是在重新塑造傳說。早在1920年代，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就提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這一觀點^①。毛澤東的形象是否也如「古史」一樣，是層累地造成的？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石川禎浩的《「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以下簡稱《紅星》，引用只註頁碼），廣泛運用了中國、美國、英國、俄羅斯（蘇聯）、日本的相關歷史資料並對之進行相互比較考證，生動地描述了毛澤東錯綜複雜的早期形象的形成、改變和在國內外的傳播過程。換言之，《紅星》的目的在於將累積而成的毛澤東形象層層分解，回溯其最初的歷史源流與演變過程。

石川禎浩以《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而享譽海內外學術界^②，其研究成果因為總能「別出心裁、知微見著」，所以往往讓讀者「很有讀學術偵探小說的感覺」（扉頁，楊奎

松、陳永發評語)。顯然，《紅星》依舊體現了作者這種嚴謹細緻、洞幽燭微的風格。全書以「毛澤東照片之謎」作為主要線索，抽絲剝繭、層層深入，最終引申出中、蘇、英、美、日等國出版審查制度之大問題。無論是史料的批判與考證，還是立論的公允與嚴謹，作者自始至終都展現了史學家的矜持與自省。

《紅星》一書為日文版《赤い星は如何にして昇ったか——知られざる毛澤東の初期イメージ》的完整形態^③。相比於面向一般讀者的日文版，本書的篇幅不僅增加了20%左右(增加的重點為《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原名《紅星照耀中國》〕面世後的遭遇與不同版本之間的考證)，還補充了詳實的註釋。全書除去序章與結語，共分七章。從內容上而言，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四章)考察的是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的名著《西行漫記》問世以前，毛澤東撲朔迷離的早期形象，第二部分(第五至六章)考察的是《西行漫記》的問世過程與毛澤東形象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第三部分(第六至七章)考察的是《西行漫記》問世之後在各國的遭遇，即各國出版審查制度的異同問題。下文將採取分別與本書三個部分相對應的形式，概述全書的主要內容；然後，筆者將提出若干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 神秘的早期毛澤東

今日之毛澤東形象，可謂婦孺皆知。但是在1920、30年代，外

界對嶄露頭角的毛澤東卻知之甚少。甚至是從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就大力支援其革命活動的共產國際，也對毛澤東的基本情況掌握不全。1930年3月，共產國際雜誌《國際新聞通訊》(*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介紹毛澤東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誤報其已經病逝的訃告。共產國際保存的1935年毛澤東履歷表甚至沒有記載他的出生年月日與出生地的省份(頁38、50)。

《紅星》第一部分通過拼圖遊戲式的推理發現，在1937年斯諾發表毛澤東近照(即頭戴紅軍八角帽的照片等)以前，各國報刊雜誌使用的毛澤東肖像幾乎都取自1927年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紀念合影——儘管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經過了加工和修飾。有趣的是，1937年8月日本政府公報附錄《週報》刊登的毛澤東照片卻是一個「胖閻佬」，提供資訊來源的竟然是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的中共問題專家波多野乾一。當時的日本政府因為對共產主義極度敏感，所以故意採取了操縱輿論的做法。也就是說，日方已掌握斯諾拍攝的毛澤東照片，但由於這類照片形象較好，不符合日方希望塑造的「共匪」邪惡形象，因此照片被故意置換成一個毫無革命家氣質的胖閻佬。這個胖閻佬到底是誰？《紅星》在分析了馮玉祥和李杜的可能性後，否定了這兩種推論(頁124-36)。筆者認為，胖閻佬是何人其實並不重要，因為他只是日方操縱輿論的一個工具。而且這是一個無解之題，因為日本當局為了欺騙民眾，一定會盡量選擇大

全書以「毛澤東照片之謎」作為主要線索，最終引申出中、蘇、英、美、日等國出版審查制度之大問題。無論是史料的批判與考證，還是立論的公允與嚴謹，作者自始至終都展現了史學家的矜持與自省。

如果說 1936 年以前，關於毛澤東的資訊還存在諸多以訛傳訛的情況，那麼 1936 年斯諾的採訪報導則改變了這種情況。《紅星》認為，斯諾通過實地採訪後向外界傳播的資訊，造就了一種典範轉移。

部分人都不熟悉的人物照片，否則這種輿論操縱就毫無意義。

在傳記方面，《紅星》首先考察了中國最早的毛澤東傳記，也就是 1932 年 7 月 15 日在上海《文化日報》上登載、署名孫席珍的〈共黨主席——毛澤東〉，以及國內外多部名人錄中毛澤東的正誤情況。在此基礎上，本書對愛倫堡 (Georgy B. Ehrenburg) 的〈毛澤東——略傳〉(1934 年 11 月)、哈馬丹 (A. Hamadan) 的〈毛澤東——中國勞動人民的領袖〉(1935 年底至翌年初連載)、高自立的《毛澤東傳略》(1936 年) 等海外的毛澤東傳記進行了對比考證，發現各種傳記之間存在着複製演繹、以訛傳訛的問題。例如，毛澤東身體病弱、曾經在北京被捕等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就在多個版本的傳記中被誤傳 (頁 89)。在作者看來，假資訊、假肖像同樣值得探究，因為「人 (歷史人物) 的行為不一定都有正確的、準確的資訊作根據」，「了解錯誤的信息如何產生和傳播、又如何為人所接受，無疑也是歷史學的重要使命」(頁 110)。在網絡時代，資訊的數量不僅過多，其內容也真假難辨。《紅星》的歷史觀點實際上也反映了今日之現實。

《紅星》通過考察海外毛澤東傳記的傳播，還提出了一些與前人不同的觀點。例如，在絕大多數的歷史著作中，以王明為首的莫斯科派與毛澤東的關係，一般都被描述為水火不容。但是《紅星》認為，至少在 1930 年代前半期，王明是毛澤東的主要支持者，因為宣傳和推廣毛澤東在第一線所取得的成績，意味着王明可以增加自己在莫斯

科的政治資本；同時，也因為蘇聯共產黨高層如斯大林、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等人對作為革命家的毛澤東頗有好感 (頁 71-76)。可見，毛澤東與王明以及莫斯科派的關係，並非是單純的二元對立關係，歷史學者有必要重新審視這一問題。

三 「紅星」的升起

如果說 1936 年以前，關於毛澤東的資訊還存在諸多以訛傳訛的情況，那麼斯諾的採訪報導則改變了這種情況。1936 年 7 月初，斯諾攜帶兩部相機及二十四隻膠卷，進入紅色中國的領地——陝北。此次訪問共耗時三個多月，10 月下旬，斯諾抵達位於北平的住所。《紅星》認為，斯諾通過實地採訪後向外界傳播的資訊，造就了一種典範轉移，因為它使此前有關中共的資訊、看法突然不再具有任何意義 (頁 94)。

《紅星》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了斯諾的延安採訪、《西行漫記》的問世過程以及毛澤東形象的典範轉移問題。由於斯諾對其延安之行的詳細經過避而不談，因此人們往往誤以為斯諾是隻身勇闖「赤匪巢穴」的冒險記者。實際上，斯諾的採訪是經過慎重、縝密的準備和交涉，在歷經失敗後才得以實現的。作者分析了以下三點原因：一是天時。1935 年中共發表〈八一宣言〉，希望爭取統一戰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正需要有記者向外界宣傳這一新方針。此時，斯諾恰好通過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宋慶齡、

馮雪峰的渠道與中共取得了聯繫。這一時期中共與莫斯科的無線電聯繫中斷，也給斯諾的訪問提供了條件，因為莫斯科方面未必相信斯諾的政治立場，有可能插手阻攔。二是地利。對延安實施軍事封鎖的張學良的東北軍與中共在抗日方面立場一致，斯諾一行才被默許通過封鎖線進入延安。三是人和。斯諾通過支援救國運動和進行採訪、交流，在中國建立了深厚而廣泛的社會關係。其中，宋慶齡的牽線搭橋起了關鍵作用（頁139-42）。筆者認為本書的分析非常準確。實際上，1935至1936年間，同樣希望進行實地採訪報導的記者范長江，曾經沿着長征的路線一路尋找紅軍，卻苦於缺乏天時、地利、人和等要素，而沒有獲得與斯諾同樣的歷史機會④。

《紅星》在多處特別提到了中共與莫斯科的通訊聯絡問題。在作者看來，與莫斯科的聯絡中斷，實際上是中共學習如何掌握自身命運的重要機遇，而最重要的例證就是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頁77）。如前所述，與莫斯科的聯絡中斷也給斯諾潛入延安提供了條件。筆者贊同作者的這一推斷：就在斯諾採訪兩年多後的1939年，莫斯科就警告中共，不可過於相信斯諾，因為他可能與「托派」有勾連（頁215-16）。1949年2月，莫斯科又再次插手阻攔中共與美國人的交往，其中涉及斯諾的問題。斯大林致電蘇共在中國的代表米高揚（Anastas H. Mikoyan），要求其通報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機關編輯部工作的美國人李敦白是一個陰險的美國間諜，我們建議立刻逮捕他」，「美

國作家安娜·路易絲·斯特朗是一名美國間諜……我們建議今後不要與她接近，不允許她到中共佔領的地區」⑤。毛澤東對此事「非常吃驚」，表示「這些他們都將執行」，並稱「1936年起還有另外一個叫馬海德的美國人住在他們那兒，他加入了這裏的共產黨。任弼時補充說，馬海德是經記者斯諾介紹留下的」⑥。儘管事件發生時間並不相同，但可以看出，莫斯科時常干涉中共與美國人的接觸。

四 各國出版審查制度的比較分析

《紅星》最後一個部分主要考察的是《西行漫記》各個版本的異同，以及該書問世之後在中國、蘇聯、英美、日本的遭遇，即各國出版審查制度的異同問題。1949年以前，《西行漫記》的各種中文版本大量出版（也受到過蔣介石政府的查禁）。但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該書卻成了禁書。直至1960年斯諾重訪中國時，該書才以「內部讀物」的形式再次發行。《紅星》認為該書在中國遭禁的原因是：第一，斯諾在1949年前後的諸多言行，令中共非常不安，其中包括斯諾對中蘇關係的看法，以及他公開其與宋慶齡之間的談話內容等問題；第二，《西行漫記》描述的革命史和毛澤東形象，以及書中人物的軼事、評價等，與1949年後中共確立起來的官方歷史敘述存在着偏離。但是，由於該書敘述早年毛澤東的部分是極為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可靠材料，所以在談及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發行了數種中譯本的《西行漫記》，但本書通過細緻的文本分析後發現，中譯本的《西行漫記》與任何英文版都不能完全對應，並且在翻譯上也存在人為取捨的問題，其原因無非是「為尊者諱」。

最有爭議的問題是《西行漫記》一書是否經過毛澤東的審查？在作者看來，毛澤東有選擇性地向斯諾傳遞對己有利的資訊本就是一個常識，而斯諾慎重解讀這些資訊也是他作為一個記者應當具備的基本能力。

早年毛澤東時又不得不援引該書，只能使用「一美國記者著《西行漫記》第×章」這種尷尬的形式（頁196-99）。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大陸發行了數種中譯本的《西行漫記》，但本書通過細緻的文本分析後發現，中譯本的《西行漫記》與任何英文版都不能完全對應，並且在翻譯上也存在人為取捨的問題，其原因無非是「為尊者諱」（頁201-207）。

蘇聯方面對《西行漫記》的封禁似乎更為嚴格，因為在蘇聯領導人看來，該書帶有「托派」傾向，並含有對蘇聯和斯大林的諷刺（頁210）。因此，蘇聯出版的僅為經過修改的「摘譯本」，作者斯諾與書名《西行漫記》也被隱去。與中國的情況類似，在寫毛澤東傳記時，蘇方也不得不援引該書，於是，「據毛澤東自己所述」、「據曾和毛澤東共同生活一段時間的一位原美國記者所述」這樣的引用方式就成了蘇聯出版物常用的方法（頁215）。直至今日，該書的俄文全譯版都未面世。

相比之下，《西行漫記》在英美、日本的出版境遇稍顯不同。早在1937至1938年，該書就先後出版了英國版與美國版，兩者除了選登的照片不同以外，在內容上並無差異。但由於該書具有反共產國際、反斯大林的傾向，因此受到美國共產黨等左翼陣營的口誅筆伐。1938年秋出版改訂版時，迫於壓力的斯諾不得不對該書做了局部性修改。隨着時局的變化，斯諾又在1944、1968年兩度對改訂版做過修改（頁173-85）。換言之，該書在英美雖然沒有遭遇被查禁的命運，但也時刻受到政局的影響。

在日本方面，根據《紅星》的統計，僅1937年《西行漫記》原著出版前後，日本雜誌譯載斯諾的文章至少達十四篇。在抗日戰爭前，該書的日文選譯本有兩種，但發行範圍都較小。從抗戰爆發，直至1952年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結束日本軍事佔領，該書在日本都屬於被查禁書籍。此後，全譯本才在日本開始發行，並獲得了經典名著的地位。但是，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以後，該書描述和展望的世界已與現實的中國相去甚遠，因此開始淡出日本民眾的視線（頁216-27）。

五 若干疑問

以上是《紅星》主要內容的概述，接下來筆者將提出若干值得探討的論點。

首先，最有爭議的問題便是，《西行漫記》一書是否經過毛澤東的審查？張戎和哈利戴（Jon Halliday）主張，該書在出版前曾受到毛澤東審查並被迫修改，因而令世界譁然^⑦。日本也有一些作家、記者持相同的觀點^⑧。作者認為，所謂「審查」不過是因為斯諾不精通中文，毛澤東才對其中文譯稿做過確認，而斯諾的寫作大部分是從延安回到北平後用英文完成的，所以毛澤東並不具備審查該書原稿的條件。此外，「毛澤東是否說了實話或者是否說了全部實話，這並不是簡單的是非問題，甚至一般不被視為一個需要嚴肅處理的問題」，因為「採訪者與受訪者之間，本身就存在一種『博弈』的關係」（頁159-63）。本書

也指出，毛澤東與斯諾談及富田事件、張國燾等問題時都有所保留（頁198，註釋245）。換言之，在作者看來，毛澤東有選擇性地向斯諾傳遞對己有利的資訊本就是一個常識，而斯諾慎重解讀這些資訊也是他作為一個記者應當具備的基本能力。

筆者同意《紅星》的觀點。實際上，1949年1月毛澤東在與米高揚會談時，曾經談及接受斯諾採訪一事。米高揚在會談紀要中寫道，「談到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對外聯繫，毛澤東指出，當時這種聯繫局限於與在延安的外國記者，特別是與美國記者的被動交往。現在情況變了」^⑨。也就是說，毛澤東認為當時中共在與美國記者的交往過程中並沒有掌握主導權。所以審查稿件一說難以成立。

那麼，斯諾是不是完全沒有受到中共話語的影響？或者說，通過何種途徑、在何種程度上受到了影響？《紅星》認為，斯諾通過其特殊的採訪經歷，感情、價值觀不知不覺間傾向採訪對象，這是不可否認的。作者還提及，斯諾帶着「好幾磅重的共產黨雜誌、報紙和文件」離開了延安（頁165-66）。但是，在斯諾具體的採訪經歷、其認知或著作在何種程度上受到了中共話語的影響等問題上，本書沒有作進一步的考察。

筆者無意否定《西行漫記》作為歷史資料的價值以及斯諾作為記者的洞察力。但是，我們必須追問，中共是否試圖通過某種間接或直接「布置」，藉此影響斯諾對革命聖地的基本認知？其效果又如何？畢竟，當時中共需要的並不是所謂

的「國際友人」，而是向外界釋放信號的「代言人」。例如，當時在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的童小鵬在日記中寫道，「外國人〔斯諾〕是從資產階級社會裏來到蘇區考察的，的確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今天滿街貼起洋標語了」，「說也奇怪，今天前的保安同今天大不同了，以前的街道是馬糞載道，青草蔓生，空氣似乎有點不好聞，但今日來時已是新氣象了，馬糞不見了，青草也剷除了，甚至房屋也稍加修葺了，這樣迅速的轉變，的確不能不歸功於洋人的到來」，「這兩天來保安更熱鬧了些，一方面是乾淨得較好看了，一方面是多看到一些群眾的往來」^⑩。在接待斯諾時，有些地方甚至準備了「烘製的麪包」、「濃咖啡和白糖」、「法國式烹調的飯」，這些顯然都是特為斯諾準備的奢侈品^⑪。從中可以看出，中共對斯諾的來訪，顯然是做了「布置」的。

斯諾本人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採訪時，他曾刻意問一個共青團的少年生活苦不苦，得到的回覆卻是「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於是，斯諾感歎道，「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裏想，這個年輕人是從某個紅軍宣傳員那裏把答話學得很好」^⑫。但是，斯諾似乎也存在一些誤解。例如，他將主要負責接待工作的李克農稱為「外交部的交通處長」。實際上，李克農時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該局對外稱為外交部，主要負責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以及黨內秘密交通^⑬。李克農是中共情報戰線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那麼斯諾的誤認是源自翻譯問題，還是相關方面的有意隱瞞？另外，陪同斯諾踏訪各地的胡金魁、

中共是否試圖通過某種間接或直接「布置」，藉此影響斯諾對革命聖地的基本認知？其效果又如何？畢竟，當時中共需要的並不是所謂的「國際友人」，而是向外界釋放信號的「代言人」。

《紅星》在史料運用上存在着某種不平衡現象。相比於美、蘇、日的諸多一手資料，本書在中文資料方面更偏重於回憶錄、人物傳記等二手資料。這一問題與史料的形成過程以及出版審查制度息息相關。

李長林也都是政治保衛局系統（即中共的防諜組織）的人物，這種安排是否有政治深意？

實際上，1936年8月5日（斯諾訪問延安期間），毛澤東曾向黨內、軍內發出指示，稱「現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關於長征記載。為此，特發起編製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並動員與組織師團幹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鬥、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段，於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截至10月底，黨中央共收到《長征記》徵稿二百多件、五十多萬字，於1937年2月編成^⑭。由於斯諾結束採訪回到西安是在10月22日，所以他是否從延安帶走了這些資料，我們無從得知^⑮。但童小鵬在日記中記載，「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編成後給那洋人帶出去印售，並云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⑯。可見，至少中共方面希望斯諾帶走這些資料。

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1937年2月版的《長征記》謄抄稿^⑰。考慮到1942年版對1937年版做了許多修改，1954年《黨史資料》刊印的版本又對1942年版做了修改，1955年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的版本又對1954年版做了刪改這一複雜情況，我們無法保證1937年的《長征記》謄抄稿保持了1936年10月收集材料時的原貌^⑱。如果能夠找到斯諾當時從延安帶走的中共文件，並將其與《西行漫記》的早期版本作一對照，或許可以進一步了解斯諾與中

共的內在關係。根據沈津的調查，斯諾從延安帶走的文件在1956年被贈予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現保存在該校的燕京圖書館，名為〈中共延安時代史料〉，此檔案一直不為人所知^⑲。

其次，《紅星》在史料運用上存在着某種不平衡現象。作者不僅博搜了中、美、蘇、日等多國的歷史文獻（包括圖像、未刊史料、新聞雜誌、回憶錄等多種形式），並且在使用時也極為嚴謹細緻，對文獻的考證更是匠心獨運。但是，相比於美、蘇、日的諸多一手資料，本書在中文資料方面更偏重於回憶錄、人物傳記等二手資料。筆者無意對此責備求全，而是希望讀者注意到一個重要問題——這一問題也與本書的主題，也就是史料的形成過程以及出版審查制度息息相關。

《紅星》所提及的持中共立場的人物，例如劉鼎、董健吾、馮雪峰、宋慶齡（包括本書未提及的李克農、徐冰等），都事關中共的「隱蔽戰線」，即情報工作。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2年，中共中央曾發出指示，要求「關於中央特科歷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應由各級黨史資料徵集部門在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統一指導下，有組織地開展。其他單位和個人均不得擅自收集和發表這方面的資料」，「對黨的秘密工作的組織系統、工作規律、策略手段，以及各方人士中的點線和秘密黨員，某些當時出於權宜之計的活動與做法等等，在為黨史研究提供資料時可充分寫出，但在發表時應非常慎重，嚴格注意內外有別，必要時應報請有關單位審批。要保持高度的敵情

觀念。在追溯我黨白區工作和地下鬥爭的歷史時，要注意和警戒它們在今日可能產生的政治反應和不良後果，更不要不利於今後正常的情報、保衛工作的進行」^②。

1991年，中共中央再次重申了1982年規定之有效性，並明確指出，「凡涉及我黨地下情報工作歷史的重大事件、重要案例和地下情報工作的方針政策，組織系統、策略手段、工作規律，以及重要情報工作人員的傳記、紀念文章、回憶錄等，屬中央一級新聞、出版單位辦理的，應事先報送國家安全部審核同意。屬地方新聞、出版單位辦理的，應通過當地國家安全部門轉報國家安全部審核同意。未經國家安全部審核同意的，一律不得擅自公開發表或出版發行」^③。

換言之，「隱蔽戰線」中文資料的印行不僅存在極大的限制，甚至有被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加工、修改的可能性。這意味着原本在數量上就極為有限的資料所透露的有效資訊將寥寥可數，給歷史學者（包括作者）的史料收集、解讀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正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分析師哈勒比安（Olivia Halebian）在討論蘇聯情報問題時所指出的，「我們必須假定，所有關於蘇聯情報機構的回憶錄、傳記和歷史研究，都是在反情報專家的幫助下編寫的」^④。正因為如此，有關中共的行為及意圖，特別是關於斯諾潛入延安的來龍去脈的問題上，《紅星》依舊存在一些空白區域。在探討馮雪峰「只公開一部分……省略部分，公開時已經被隱去」的報告時（頁149-50），作者顯然注意到這一點。

另外，回到毛澤東照片的問題上，令筆者感興趣的是，建國以後毛澤東的照片資訊又是如何傳播的？根據毛澤東的攝影師回憶，「當時所拍攝的照片除公開採用和少部分留作歷史資料、少部分送禮外，其餘圖片必須銷毀。底片和那些多餘的照片在銷毀時，放在一具上鎖的廢片箱內，定期燒毀。燒毀時，有專人監督，燒後灰燼也要檢查一下是否完全燒盡，任何人不得私自留底」，「我儘管拍攝了數萬張照片」，「自己手上僅有幾張（共5張）與毛主席合影的紀念照片」^⑤。換言之，1949年以後，毛澤東照片的資訊源處於被控制的狀態。實際上，不僅是毛澤東的照片，中共還建立了針對所有圖片信息的控制體系。因為「攝影圖片是宣傳工作中的有力武器」，所以中共要求「向國外宣傳的圖片今後統一由新華社發布，各地各部門不得擅自將未經新華社發表的圖片送出國外」^⑥。不知俄羅斯方面是否存有相關的圖像、音頻或視頻檔案？2014年，有報導稱湘潭大學將建立「毛澤東圖像數據中心」^⑦。但是到目前為止，筆者沒有發現此項工作有何進展。

最後，筆者注意到《紅星》存在若干校對上的技術性問題。例如，「他作為領袖說出了自己的孤獨，即無人理解自己發動文革的意圖」一句沒有標註出處（頁69）；參考文獻中的俄文著作《中國的英勇人民》（*Героический народ Китая*）一書的出版年份應為1938年，而非1939年（頁268）；參考文獻的中文著作中，不少文獻沒有註明作者或編者（頁258-63）。當然，這些細枝末節並不影響本書的學術價值，

「隱蔽戰線」中文資料的印行不僅存在極大的限制，甚至有被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加工、修改的可能性。這意味着原本在數量上就極為有限的資料所透露的有效資訊將寥寥可數，給歷史學者的史料收集、解讀工作造成極大困難。

但筆者相信，本書再版之時定能以更完美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

六 結語

《紅星》一書最大的特徵在於，將毛澤東早期形象的問題置於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之下進行梳理。作者相信，「共產主義運動本身就很有國際化……把視野放在國際，才能回到歷史的現場」^⑥。縱觀全書，應該說作者依靠駕輕就熟的史料收集和解讀能力，成功地為讀者展現了多個國家之間相互關聯的「歷史現場」。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紅星》對歷史人物既有評判與諷刺，又不失同情與理解。在作者看來，「由於已經知道歷史經過及其結果，我們有時反而無法理解當時人們擁有的日常性感受和常識」（頁239）；「我還是想跟中國人一樣思考，跟他們一起煩惱，一起找出走向未來的道路」^⑦。這或許就是作者的心聲。眾所周知，在中國大陸以外的海外輿論界，充斥着各種極具刺激性卻又缺乏真憑實據的「揭秘」類歷史著作。這類流於世俗的作品雖然迎合了人們的好奇心而廣受歡迎，但其生命也是轉瞬即逝的。相比之下，本書可謂異彩獨放。僅閱讀本書的參考文獻與附錄，筆者就能體會到作者作為史學家的那份矜持。

最後，需要提及的是，本書的名稱《紅星》是怎樣升起的》，乃是向中國史學家高華的代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致敬（頁7-8）。同時，《紅星》能夠以中文的形式面世，

也有賴於作者「最信賴的袁廣泉先生」，因為「袁先生的譯筆，忠實可信無需贅言，尤其可貴者在於能反映原文的細微之處」（頁240）。高華與袁廣泉先生都已駕鶴西去，《紅星》的面世或許是對兩位先生最好的紀念。

我們無意間佔有且已不再懷疑的歷史知識到底從何而來？影響我們歷史認知的資訊來源以及所謂的「常識」是否由於誤解、加工、整理、篡改而變得無比扭曲？這既是《紅星》作者石川禎浩作為史學家的反躬自省，也是他對今人拋出的時代之問。

註釋

①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1923年5月6日），載《古史辨》，第一冊（北京：樸社，1926），頁61。

② 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

③ 石川禎浩：《赤い星は如何にして昇つたか——知られざる毛澤東の初期イメージ》（東京：臨川書店，2016）。

④ 范長江的行蹤與採訪見聞，參見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1935年9月—1936年6月），載范長江著，沈譜編：《范長江新聞文集》，上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頁79-303。

⑤ 〈斯大林致米高揚電：關於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國人〉（1949年2月4日），載沈志華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一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頁418。

⑥ 〈米高揚致斯大林電：對斯林指示電的落實〉（1949年2月6日），載《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第一卷，頁440。

《紅星》一書最大的特徵在於，將毛澤東早期形象的問題置於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之下進行梳理。作者依靠駕輕就熟的史料收集和解讀能力，成功地為讀者展現了多個國家之間相互關聯的「歷史現場」。

- ⑦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198-200.
- ⑧ 池原麻理子：〈『中國の赤い星』スノー未亡人の激白 夫、エドガー・スノーは毛澤東に騙されていた〉，《諸君》，2006年6月號，頁70-76；譚璐美：〈毛澤東とエドガー・スノー〉，《外交》，第24號(2014年3月)，頁116-19。
- ⑨ 〈米高揚與毛澤東會談紀要：中共當前的工作方針〉(1949年1月31日)，載《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第一卷，頁380。
- ⑩⑬ 童小鵬編：《軍中日記(1933年—1936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頁219-20、223；230-31。
- ⑪⑫ 斯諾(Edgar Snow)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223-24、324；301-302。
- ⑬ 開誠：《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李克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頁93-98。
- ⑭ 〈為出版《長征記》徵稿〉(1936年8月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頁39-40。
- ⑮ 作者雖然查閱了美國的斯諾檔案，卻未說明斯諾在1936年訪問延安時具體帶走了哪些資料。另外，張虹的研究也沒有這方面的說明。參見張虹：〈美國密蘇里大學特藏館所藏斯諾文獻概況及其學術價值〉，《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9期，頁121-27。
- ⑯ 董必武等：《二萬五千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⑰ 參見劉統整理註釋：《紅軍長征記：原始記錄》(北京：三聯書店，2019)，頁1-26。
- ⑱ 沈津：《書城風弦錄：沈津讀書筆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110-13。
- ⑲ 〈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關於中央特科歷史宣傳問題的報告〉(1982年1月14日)、〈中央宣傳

- 部關於編輯出版回憶地下鬥爭讀物應當注意問題的通知〉(1982年4月29日)，載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黨的宣傳工作文件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983-84、1020-22。
- ⑳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安全部關於發表、出版反映我黨地下情報工作歷史題材作品的若干意見》的通知〉(1991年8月6日)，載《黨的宣傳工作文件選編》，第四冊，頁2030-31。
- ㉑ Olivia Halebian, "New Light on Old Spies: A Review of Recent Soviet Intelligence Revelations" (18 September 1995), www.cia.gov/static/119ff17849cdf548553419185dac0db/Recent-Soviet-Intelligence-Revelations.pdf.
- ㉒ 錢嗣傑口述，余璋著：《快門下的紅色瞬間：毛澤東專職攝影師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2014)，頁191。
- ㉓ 〈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關於攝影圖片宣傳的幾項規定〉(1952年9月)，載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黨的宣傳工作文件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121。
- ㉔ 〈湘潭大學擬建「毛澤東圖像數據中心」〉，《長沙晚報》，2014年8月19日，A10版。
- ㉕ 〈把視野放在國際，才能回到歷史的現場〉，《文匯報》(上海)，2016年7月1日，XR4、XR5版。
- ㉖ 毛升：〈石川禎浩談日本的中國現代史研究〉(2020年4月5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35554。